

当代西方宏观 经济政策理论的演变和发展

何国华

西方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经历了一系列曲折的演变和发展过程,本文拟就此作一简要分析。

一、“凯恩斯革命”和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的形成

20世纪30年代以前,在西方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是以马歇尔和瓦尔拉斯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它以“萨伊定律”为理论基础,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商品供给会自动创造自己的需求,经济中不会出现生产过剩的危机,即使现实生活中由于某种原因出现了局部的或偶然的供求失调,也会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而使均衡很快得以恢复。因此,国家没有必要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国家的作用至多只是充当私人企业的守夜人而已。

但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空前严重的经济大危机的爆发,彻底粉碎了新古典经济学自由竞争、自由放任以实现资本主义经济长治久安的梦想。在这场大危机中,资本主义世界生产水平大幅度下降,生产能力大量过剩,交易空前萎缩,失业人数猛增。另外,这场危机的广度特别广泛,不仅席卷工商业,而且扩展及于金融市场和货币制度等领域。危机在时间上也持续得特别长久,长达5个年头。这一切都有悖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常理,致使一些一贯倡导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在1931年芝加哥大学召开的哈里斯基金圆桌会议上无可奈何地宣称:传统的经济理论已不再适用于30年代的现实,必须寻找新的理论和办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应运而生。

凯恩斯理论的核心是有效需求原理。所谓有效需求是指总需求和总供给相等时的社会总需求,它决定了社会产量和就业量的大小。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其中,消费需求取决于人们当前的收入量和边际消费倾向,投资需求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凯恩斯断言,在资本主义社会,边际消费倾向具有递减的趋势,即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消费也增加,但消费的增加往往不如收入的增加那么快,这就会导致消费需求的不足。与此同时,资本边际效率即资本家的预期利润率也存在递减趋势,加之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引起灵活偏好的加强,使利息率经常居高不下,具有粘性的特征,这又导致投资需求的不足。既然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都是不足的,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有效需求就是不足的,正是有效需求的不足,引起了就业不足和非自愿性失业的存在,促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而要解决就业不足和经济危机问题,就必须做到:第一,设法提高边际消费倾向,以便扩大消费需求;第二,设法提高资本边际效率或降低利息率,以便扩大投资需求。但是,上述两个方面仅靠私人力量不足以实现,只有扩大政府的作用,对经济进行干预,从这两方面提供足够的有效需求,失业和危机问题才能得以解决。

为了提高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凯恩斯主张实行累进所得税,进行收入再分配,以增加消费支出,扩大有效需求。但由于短期内边际消费倾向是比较稳定的,单靠税收支持不足以克服经济危机和提高就业水平,还必须采取各种办法扩大政府支出。凯恩斯认为,政府增加的支出,只要能够刺激经济增长,并使个人收入增加,即使经常出现财政赤字也无关紧要。而且,为了避免损害私人资本的利益,财政赤字不能依靠增税来解决,只能通过举债加以弥补。此外,凯恩斯还提出“半通货膨胀”政策以解决经济危机和就业不足问题,他认为这种通货膨胀既可以扩大社会支付能力,又可以压低利率,而低利率既能刺激消费,又能刺激投资,均有利于经济和就业的增加。不过,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凯恩斯更注重前者的作用,认为后者只起辅助作用。在凯恩斯看来,货币政策是通过利率而间接起作用的,不如财政政策来得直接而有力。而且根据他的经验,似乎单靠货币政策不足以成功。因此他写道:“我现在有点怀疑,仅仅用货币政策操纵利率到底有多大成就。……故我希望国家多负起直接投资之责。理由是:各种资本品之边际效率,在市场估计办法之下……,可以变动甚大,而利率可能变动范围太狭,恐怕不能完全抵消前者之变动。”

凯恩斯的经济学说产生之后,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些经济学者把它同斯密的《国富论》相提并论,把凯恩斯经济学看成是经济思想史上的一次革命。这里我们姑且不论它是否一次真正的革命,但毫无疑问的是,正是在凯恩斯经济学产生之后,西方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才成为经常化的事情,尽管此前也不乏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的例证,如经济大危机中的“罗斯福新政”,但这些干预都缺乏必要的理论根据。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凯恩斯经济学的产生也标志着西方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的形成。

二、从“补偿性”财政货币政策 到“增长性”财政货币政策

如前所述,凯恩斯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时期,因而其经济政策主张也都是针对经济危机而提出的。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并不总是处于危机之中,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失业问题已不再像30年代那样严重。所以,许多经济学家提出,经济政策不能总是一个基调,而应当根据经济中繁荣和萧条的更替,交替地使用紧缩和扩张政策,即“补偿性”财政货币政策。

“补偿性”财政货币政策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汉森最早提出的,其基本含义是: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可以有意识地增加财政支出,减少税收,以刺激总需求;在经济繁荣时期,则要减少政府支出,增加税收,以抑制总需求,并求得繁荣与萧条时期的相互补偿。据此,政府在确定财政预算时,就不能把平衡财政收支这

一传统信条作为准则,而要按私人支出的数量来安排政府的预算,使私人支出和政府支出的总额可以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由此导致的财政赤字可以用繁荣时期政府紧缩开支所产生的盈余来弥补。换言之,只要萧条时期因扩大政府支出而发生的赤字能够被繁荣时期政府紧缩开支而产生的盈余所抵消,从而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充分就业的实现,就不必强求财政预算年年平衡,只需在一个经济周期内达到收支平衡就可以了。

但是,要想使资本主义经济能够实现既无失业又无通货膨胀的长期稳定增长,仅有“补偿性”财政政策是不够的。萨缪尔森根据IS—LM模型的分析指出,财政政策固然是重要的,但为了在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的条件下实现充分就业,货币政策也很重要。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萨缪尔森又提出了“补偿性”货币政策,其基本含义是:中央银行可以在经济萧条时期放松信用,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息率,以刺激投资和社会总需求的增加;在经济繁荣时期,则可以紧缩信用,减少货币供给,提高利息率,以抑制投资和社会总需求。

总之,所谓“补偿性”财政货币政策,就是要根据经济的一盛一衰,交替使用紧缩政策和膨胀政策,其特点是“逆经济风向行事”,即在萧条时期设法使经济繁荣,以消灭失业;在繁荣时期又要抑制过度繁荣,以控制通货膨胀,实现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整个50年代,美国政府奉行的基本上是上述“补偿性”财政货币政策,其结果是使这一时期美国的经济波动比战前平缓得多。然而,这一时期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很缓慢,1953—1960年美国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只增长2.5%,明显低于其他国家,特别是低于当时的西德和日本,出现了所谓“艾森豪威尔停滞”。

为了克服“艾森豪威尔停滞”,加速经济增长,60年代初期美国经济学家托宾、奥肯、海勒等人又提出了“增长性”财政货币政策理论,其主要内容是:不仅要在萧条时期实行膨胀性财政货币政策,即使是在经济回升时期,只要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小于潜在的(即充分就业的)的国民生产总值,也要通过膨胀性财政货币政策人为地刺激总需求,使实际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潜在的国民生产总值,从而实现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托宾把这种经济政策理论称为“新经济学”,它新就新在“确信商业循环不是不可避免的,确信在不变的失业率目标下政府政策能够而且应当使经济接近于稳步的实际增长。”

托宾等人指出,实行“增长性”财政货币政策,首先是要把财政政策从过分害怕赤字的旧框框下解放出来,大胆实行赤字财政政策。具体措施包括:(1)减税,尤其是减少个人所得税;(2)实行投资赋税优惠来刺激投资;(3)变更耐用消费品消费税的办法来刺激消费;(4)根据失业的情况决定发放或停止发放失业津贴补助;(5)扩大赤字增加政府支出等。那么,连续不断的赤字靠什么来弥补呢?凯恩斯提出的办法是举债,而托宾等人则认为赤字支出不能仅靠举债来弥补,因为仅靠举债弥补赤字,必定会引起利息率的上升,而利息率的上升反过来会限制私人投资和消费,最终赤字的收入效应将被抵消。所以,要使赤字财政政策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必须同时配合实行膨胀性的货币政策,具体措施包括:(1)协调各国的货币政策,使各国短期公开市场证券的利息率接近以减少国际间的资本流动;(2)在国内,货币管理当局的活动应该更接近于它所试图控制的支出决定;(3)财政部发行一种可以买卖的具有购买力保证的公债,以帮助中央银行控制实际利息率,并增加它对投资市场的影响等。

“增长性”财政货币政策很快被当时的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所采纳,他们不像其前任以消除经济波动为目标,而是以刺激经济增长为目标,无所顾忌地推行规模越来越大的赤字财政政策和膨胀性货币政策。上述政策的实施在60年代前半期的

确较为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好景不长,到60年代后期,由于把赤字财政当作常规手段,使得赤字规模越来越大,终于酿成了70年代初期严重的“滞胀并存”问题。

三、20世纪70年代以来需求管理政策有效性的争论

面对“滞胀并存”的严酷现实,凯恩斯主义并不认为这是20世纪60年代的“增长性”财政货币政策的失败,因为一种政策不能同时达到两个目标,正如不能因为“小儿麻痹症预防剂不能治疗癌症,就判定是一种失败一样。”它只是说明现在不能仅仅采取加速经济增长的膨胀性财政货币政策,而必须与此同时采取其他多种政策措施来治疗膨胀性政策的副作用。所以,7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又在基本执行宏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基础上,提出了下列经济政策主张:(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微观化”,即政府针对个别市场和个别部门的具体情况来制定区别对待的财政货币政策;(3)收入政策,主要是指限制各种生产要素的收入增长率,使之与劳动生产率相适应,从而限制物价上涨的政策;(4)人力政策,也叫劳工市场政策,是针对劳动市场的不完全性,解决失业和职位空缺并存的矛盾,从而增加就业机会的政策。

但是,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主张遭到各种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批判,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认为需求管理在短期内或许是有效的,可以降低失业率,但在长期中它不仅不能降低失业率,反而还会加剧通货膨胀。关于财政政策,弗里德曼认为,由于:第一,政府措施迟缓,不能适应经济瞬息万变的需要;第二,即使政府能适时推出某种财政政策,但财政政策起作用要有一个长而易变的滞后过程;第三,财政开支的“挤出效应”和“自然失业率”的制约,财政政策必然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如果实行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它可能会获得成功,但在长期肯定也是失败的。原因在于,货币数量和利息率之间存在着变化不定的关系,货币数量的增加在开始时会使利息率下降,从而刺激消费和投资的增加,但人们支出的增加又会引起物价上涨,并导致货币需求增加,进而引起利息率的上升。同时,由于物价上涨,使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也上升,这时存款人和放款人都要求更高的利息率,从而进一步加速了利息率的上升,其上升的幅度可能超过原来下降的幅度,这样货币政策自然也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

正是基于对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的分析,货币主义反对需求管理政策。他们认为,市场经济有其内在的稳定性,国家干预与需求管理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而不是稳定经济的政策,而是使经济不稳定加剧的政策。但是,由于货币数量的变动可以直接影响名义国民收入,特别是在长期会造成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从而引起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所以,货币当局必须发挥自主的作用,控制货币数量的变化,按照某一固定比率增加货币供给量,以稳定货币与物价,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这是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也是货币当局唯一能够做到的,因而称之为“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

理性预期学派则认为,需求管理政策不仅在长期,甚至在短期也不会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从而是完全无效的。这主要是因为,各经济行为主体的预期是合乎理性的,他们会考虑到过去的失误,并在必要的时候修正自己的预期,以便在行为决策中成功地消除那些引起失误的规律。如果预期是理性的,政府政策就不会对经济产生真正的影响,因为只要各经济行为主体希望维持原先的地位,就必然会设法抵消这些政策的作用。例如,当政府为了减少失业而准备采取扩大货币供给量的措施时,人们会事先估计到这种做法会导致物价水平的相应上涨,从而引起实际工资的下降,于是就会在物价上涨之前要求提高

货币工资。而只要工人的货币工资提高了,雇主就不会因需求的扩大而增加雇佣工人,这样原有的失业率即使从短期来看也不会得以下降。政府政策要想获得成功,只能通过采取随机行为,欺骗公众,使之无法作出理性预期。但欺骗是不能长久的,正如西方一句谚语所说:“你可以在一段时期内欺骗所有的人,或者是在所有的时期内欺骗一部分人,但是,你决不能在所有的时期内欺骗所有的人。”一旦人们了解到政策的真相,政策也就无效了。更糟糕的是,当人们搜集到错误的信息之后,会作出错误的反应从而使经济更加震荡。这说明随机政策行为的结果不是稳定了经济,而是加剧了经济的不稳定。

既然需求管理政策是徒劳无功的,政府就应该尽量不使用经济政策去干预经济,而是尽可能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但是,理性预期学派也认识到,在当今现实社会中,要政府完全不介入经济活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经济衰退时期,迫于选民的压力,政府必须采取一些行动来表示它是关心经济的。不过,政府在使用经济政策时一定要注意政策的“信誉”,也就是要公开自己的政策,让政策连续持久,避免政策的多变,以使人们能够与之配合。具体来说,政府的财政政策应该保持公开持久的税率,使税收所得刚好能支付政府的开销就行,尽量避免不停地增税减税,使人们无所适从。而货币政策则如同货币主义所建议的那样,保持货币供给稳定增长,以避免货币供给量突变所引发的经济波动。

四、凯恩斯主义复兴与宏观 经济政策理论的新发展

传统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普遍“滞涨并存”的困境面前,不是束手无策,就是解释乏力,所以在与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论战中一度处于劣势。不过,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从来不承认自己的失败,也不甘心于这种失败。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西方各国相继走出“滞涨并存”的局面,失业和经济停滞再次成为各国政府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凯恩斯主义出现了强劲的复兴势头:一方面,以萨缪尔森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卷土重来,以“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的面目重新活跃起来;另一方面,一批年轻的凯恩斯主义者,致力于为传统凯恩斯主义提供微观经济学基础,他们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性推出工资和价格刚性以及非市场出清,重新得出适当的需求管理仍然有效的结论,从而给政府干预经济生活以新的理论支持。为了区别于萨缪尔森等人的理论,一般称之为新凯恩斯主义。

如前所述,在理性预期学派看来,由于公众的预期是合乎理性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从而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只有在公众没有预期到的时候才会对产出的增加起一定作用,一旦公众改变预期,这种作用就不存在了。新凯恩斯主义则从不完全竞争和价格刚性出发,认为公众虽然能够进行理性预期,但却无法根据预期的物价调整其货币工资,从而总供给曲线就无法随预期物价的变动而充分移动,因此,可预期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仍然是有效的,只不过其效果不如非预期的那么显著而已。此外,新凯恩斯主义还通过对资本市场不完善,尤其是信贷市场不完善的分析,提出了不同于传统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传统凯恩斯主义理论中,利率是货币政策的核心机制,货币当局增加货币供给量的结果使利率下降从而增加投资,并通过乘数效应引起总需求和国民收入的变动。但在新凯恩斯主义看来,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完善而产生的股权配给和信贷配给,既限制了企业采用新股票融资的能力,又约束了企业采用举债融资的能力。对银行来说,银行也背负着很大的竞争压力,主要表现为储户和银行资产的安全以及破产的可能性。因此,银行也是厌恶风险的,在不良经济环境中,必然采取厌恶风险的行为,即选择能保证银行预期收益最大或破产机会最小化的

最佳利率率,而不管它是否能够影响投资水平。所以,在经济衰退时期,通常是银行贷款的意愿和能力,而不是居民对货币需求较高的利率弹性限制了货币政策发挥作用。换言之,只有通过改变银行的贷款意愿和能力影响信贷的可得性,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才能影响实际经济活动。

新凯恩斯主义认为,使货币政策对产出有效的那些因素一般也会使财政政策有效,因为这些因素造成了价格刚性,而价格刚性会使任何影响总需求的政策变得有效。与货币政策不同的是,不完全竞争本身就足以使财政政策对产出起到明显的作用,原因在于:第一,需求弹性对不完全竞争市场上的工资和价格决定具有实质性的影响,从而政府影响需求弹性的政策就有潜力来改变相对价格;第二,不完全竞争影响了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比例,在收入分配影响均衡的地方,竞争程度会改变政府支出冲击的大小。新凯恩斯主义还对“李嘉图等价定理”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批判。按照“李嘉图等价定理”,税收和公债是等价的,债务融资不过意味着赋税的延期征收,因为公债还本付息的负担最终还是落在纳税人头上。很显然,如果“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财政政策特别是赤字财政政策就是根本无效的。新凯恩斯主义不赞同“李嘉图等价定理”,认为据此得出财政政策无效性结论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和经验事实也是相悖的。具体说:第一,“李嘉图等价定理”所基于的阿罗—德布鲁市场是虚幻的,一个人不可能在其生命周期的不同时间之间,或者在不同时间上自己与他人之间进行交换,政府有能力分担私人市场所无法分担的风险;第二,政府财政政策通常能够导致代际间的收入再分配,因为私人对未来收入进行贴现所采取的是实际利率加上死亡概率,而政府只以实际利率对税收进行贴现;第三,大量证据显示,相当一部分人在特定的时点是存在流动性约束的,由于暂时的赋税改变,流动性约束会改变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第四,“李嘉图等价定理”所隐含的个人效用最大化、个人理性、富有远见以及计算能力等都是脱离现实的。此外,新凯恩斯主义还求助于经验研究证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虽然验证的结果低于传统凯恩斯主义的估计值,但远不是完全无效的。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理论的兴起,不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还是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都不得不重新考虑预期在经济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由此产生了博弈论在宏观经济政策理论中的运用问题。根据博弈论,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到私人部门的反应,并对其作出反应,因为私人部门也在预期政府行为并对其作出反应。一般来讲,在这个政策游戏里面,一个反通货膨胀的政府要想使私人部门相信它的真实意图,将必然付出一个时期的相当高的代价,因为私人部门也许认为政府是一个赞成通货膨胀的政府。所以,政府的政策制定者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其可行办法要么是将政策立法,如将货币规则立法保证;要么是重新寻找取得私人部门信任的途径。但是,这一方法的运用必须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一是公众必须是会计算的理性人,二是政府必须是有信誉的政策制定者,否则公众根本不会相信。因而这一方法至今还只是理论分析,尚无实际运用的例证。

注释: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文版,13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詹姆斯·托宾:《十年来的新经济学》,中文版,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金融学系 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江 春)